

儿歌何时走进春天里

本报记者 余英茂

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、《歌声与微笑》、《小燕子》、《丢手绢》……曾几何时,这些朗朗上口、活泼健康的儿歌被广为传唱,激励和鼓舞了很多人。如今,流行歌曲走红,很多连歌词大意都不能准确理解的少年儿童,却成了成人歌曲的粉丝,甚至传唱变了味的“灰色儿歌”。对此,很多家长疾呼:还孩子生动有趣、健康快乐的儿歌!

追逐流行和成人歌曲,对少年儿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?什么样的歌曲才适合少年儿童传唱?在“六一”儿童节来临之际,让我们走进儿童的音乐世界。

儿童偏爱成人歌曲

少儿天性爱唱歌,如今的孩子在唱什么歌呢?

连日来,记者在我市数家小学门口随机对几十名小学生进行了调查。问到自己喜欢唱的歌曲时,多数小朋友回答的都是流行歌曲:“我喜欢《老鼠爱大米》!”“我喜欢唱《波斯猫》!”“我喜欢《隐形的翅膀》、《两只蝴蝶》、《嘻唰唰》……”

在郑东新区某小学上四年级的女生小莹告诉记者,班上的同学都有自己喜欢的流行歌星,她对很多流行歌曲都是耳熟能详:“我喜欢周杰伦的《稻香》,蔡依林的《爱情三十六计》,还有刘德华的《忘情水》……”令人惊讶的是,如今的孩子,不知道乔羽、谷建芬是应当尊敬的儿歌作曲家,却对流行歌星比较喜欢,几乎人人都能来上几曲流行歌,满脸稚气的嘴里,懵懵懂懂地哼唱着“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,飞越那红尘永相随……”

而喜欢儿歌的小朋友却是寥寥无几。采访中,仅有3位小朋友向记者表示,自己最喜欢唱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、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、《蜗牛与黄鹂鸟》等儿歌。

纬五路一位四年级的女生家长苏先生告诉记者,现在的孩子说起流行歌曲都很熟悉,张口闭口就是“嘻唰唰,嘻唰唰……”、“你是我的玫瑰,你是我的花……”,却并不知道《小螺号》、《卖报歌》、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这些曾经流传广泛的好儿歌。

对孩子热衷唱流行歌曲的“早熟”行为,家住市东明路的王女士显得很无奈:“儿子不到12岁,嘴里唱的不是周杰伦就是蔡依林的歌,他的房间里也贴满了李宇春、蔡国庆、张学友这些流行歌星的图片,港台流行歌他基本都会唱,很多都是情歌,情呀爱呀的什么都唱,这是不是有点不正常?”

“变味儿歌”风行一时

在采访中记者发现,不仅“儿歌成人化”现象大行其道,一些被改编的“另类儿歌”也在孩子们中间传唱开来。

“最近比较烦,比较烦,作业都快堆成山,堆成山……”“书包最重的人是我,作业最多的人是我,起得最早的,睡得最晚的,是我还是我……”在多所小学门口,记者听到了这样的“儿歌”。

这些变了味的“改编儿歌”大都起源于经典儿歌、古诗词或流行歌曲,改编后充满了调侃、

恶搞、低迷、消沉等不健康内容,比如“锄禾日当午,地雷埋下土;李白去挖地,炸成二百五”等等。

很多家长反映,现在孩子们很喜欢传唱“灰色儿歌”,让他们很是忧虑。“让我背也好,让我写也好,恨老师我都不写了。让我哭也好,让我笑也好,随风飘飘,上网最逍遥……”金水区纬一路某小学12岁的小萌经常哼着这些“变味”的儿歌,其家长张娟忧心忡忡地说:“女儿说这些歌很流行,同学都在唱。但是这些儿歌有的恶搞,有的很低俗,我担心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不良影响。”

与流行歌曲和“灰色儿歌”风行一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家长和教育工作普遍反映,时下的好儿歌比较少。

“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要唱《聪明的一休》、《小鸭子》、《花仙子》等儿歌,那旋律和歌词现在都忘不了。如果没有儿歌陪伴,童年就会少了很多欢乐!”谈到记忆中的儿歌,作为70后的张娟一脸幸福,她满以为儿歌也会伴随着女儿幸福地成长,可是自己以前唱的那些儿歌网上不太喜欢,听来听去都是那几首,她就在网上和音像店去找儿歌,却很难找到新的好儿歌作品。

记者走访了市区几家超市及音像店,发现儿歌类磁带和CD碟虽然数量不少,却多是年代较远的儿歌,有价值的新儿歌寥寥无几。在世纪联华超市音像柜台,售货员找出了三四盘儿歌CD,记者发现包装新颖的目录上却是《找朋友》、《歌声与微笑》、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等耳熟能详的“老面孔”。几位在挑选碟片的家长说,这些儿歌孩子看了几次就不爱听了,感觉这些歌题材老化,跟他们现在的生活结合不紧密。

惠济区的一位小学校长无奈地告诉记者,学校这些年举办“六一”儿童节文艺晚会时,找不到多少可歌可舞的优秀儿歌,只好把《拔萝卜》、《小螺号》、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等几十年前的老儿歌拿来凑数。

该校的音乐老师孟静也向记者诉苦说,眼下适合孩子们唱的优秀儿歌较少,学生有时就要求教他们唱流行歌曲,音乐课上教孩子唱什么歌,她有时也感到无所适从。“其实,我也很想教学生唱好的新儿歌,可是很难找到合适的。”



“世界儿童日”鲜为人知

好儿歌怎么不见了

从众多脍炙人口的儿歌广为传唱,到现在“灰色儿歌”大肆流行,人们不禁要问:优秀的好儿歌怎么不见了?

在一次全国歌唱选拔赛上,一位参赛小学生演唱的是流行歌曲《一个人的精彩》,许多评委认为儿童唱这样的歌曲不适宜,这位学生却反驳说,音乐课上的儿歌不好听,曲调也不上口,自己不感兴趣。

谈到导致现在的孩子不爱儿歌爱流行歌曲的原因,国家一级作曲家岳亚认为,大环境缺失是一大原因。现在,荧屏、电台少儿儿歌、纸媒上也难觅儿歌踪影,全国有不少儿童刊物,但只有一本中国音协主办的《儿童音乐》,各类文艺活动繁多,专门为少儿举办的活动却很少。在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,路边的音像店会播放流行歌曲,孩子们想不听都难。而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和旋律都很优美,流行歌曲的影响铺天盖地,孩子们耳濡目染,嘴里哼的多是“哥哥妹妹”、“情啊爱啊”的成人歌曲,当然也就不奇怪了。

在很多孩子眼里,那些被改编过的“灰色儿歌”显得十分“好玩”、“搞笑”。北大附中河南分校教师李淑芳认为,儿童喜欢唱“灰色儿歌”,原因是当前学生觉得学习比较紧张、单调和乏味,一些学生就图好玩改编了儿歌,而孩子们缺乏辨别力,并不是特别明白歌词的意思,但是出于好奇,很容易接受那些改编过的“灰色儿歌”。

现在的孩子们相对来说“见多识广”,大都喜欢故事性强、节奏明快、内容有趣的歌曲,不少孩子觉得“经典儿歌太土,新儿歌说教,另类

儿歌有趣”,还是成人流行歌曲好听。

除了在学校音乐课上学的被几代人传唱了无数遍的“老儿歌”,确实很难找到新的好儿歌。“孩子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周先生感到,女儿的音乐世界正在面临“无米下锅”的困境。他说,现在的很多新儿歌,歌词多是空泛、简单的说教,缺少天真感,孩子很难提起兴趣。而昔日的那些经典的儿歌,由于时过境迁,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,能反映当今儿童生活、心理、语言生动形象,节奏欢快的新儿歌比较缺乏。”

“现在,儿歌传唱不广,是因为孩子的课余时间变得丰富多彩了。”市民刘先生存在不同看法,他认为现在孩子的课余时间越来越多样化,电脑、电视、学习机、电子玩具等文化娱乐工具让孩子应接不暇,儿歌在他们生活中也就越来越不受重视了。

据了解,目前在刊物上发表一首儿歌,词曲作者获得的稿酬不足百元,而一首好的流行歌曲,创作者能得到上万元稿酬。

创作儿歌很难在市场上获取多少直接效益,词作者晨枫向记者坦言,创作儿歌没钱可赚,现在词曲作家没人愿意谱写儿歌。儿歌既不如流行歌曲传唱广泛,也不像成人歌曲那样被广泛关注,创作者的成就感不强,因此,很多词曲作家将儿歌视为“小儿科”,音像公司与词曲作者签约也只是约定写流行歌曲,全国也很少举办儿歌创作比赛,导致儿歌创作队伍日渐萎缩,儿歌产量锐减,能感染人的优秀儿歌作品更是难以出炉。

怎样才能创作出好的儿童歌曲呢?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的作者乔羽说过,秘诀其实很简单——喜欢小朋友,并拥有一颗童心。时下,有些业余作者没有深入生活,很难真正从儿童的角度想问题,写出来的儿歌作品没有什么“童趣”,孩子们当然不喜欢了。

显而易见,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,音乐界人士创作积极性不高,导致优秀儿歌匮乏。好的儿童歌曲本来就不多,加之推广不力,成人歌曲、“另类童谣”便乘虚而入,当下的儿歌可以说是处境尴尬。

儿歌如何摆脱尴尬

我们很多人都是唱着《我们的田野》、《小草》、《娃哈哈》、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、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等儿歌长大的。这些儿歌让我们有了快乐的童年,有了基本的是非判断,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

歌唱家李双江指出,“音乐养心”,好的儿歌承载着优秀的文化和道德观念,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养料。没有

儿歌相伴的童年缺乏色彩,因此许多家长呼吁:给儿歌撑起一片蓝天!

每年的3月21日是“世界儿童日”,这个节日早在1976年就设立了,记者在街头调查发现,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节日。

“六一”前夕,《中国民办教育》杂志曾准备举办一场全国儿童歌曲演唱大奖赛,需资金20万元。主办方多方联系了20多家企业合作,都遭到婉言谢绝,理由是“儿歌比赛的广告效应不明显,商业效益差”。经费没有着落,儿歌大赛也就不了了之。该杂志社社长童永格呼吁:儿童是祖国的花朵,儿歌只有得到全社会的广泛支持,才会得以振兴。

种种现状,让音乐界人士大声疾呼:全社会对儿歌的关注不够,造成了优秀儿歌“难产”。公众的支持,是让优秀儿歌流行开来的主要动力。

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,我国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儿童歌曲创作队伍,对儿歌词曲作家乔羽、谷建芬、潘振声、李幼容、晨枫等人的名字,人们大多耳熟能详。近年来儿歌创作的人越来越少,著名儿童音乐家潘振声建议,儿歌振兴的希望首先在振兴儿歌创作,应当出台政策,扶持词曲作者创作出大量适合当代少儿生活情趣、审美需求、深受当代少儿喜爱的儿歌。广播电台、电视台等各类媒体也应辟出更多的空间和专门的少儿频道,多策划、组织少儿歌咏活动,宣传推介好的儿歌。

振兴儿歌不仅是学校的事,家长也应重视起来。音乐教师孟静建议,家长要引导孩子传唱适合他们年龄阶段的儿歌,但也不要对孩子喜欢流行歌曲过于敏感,大力进行“批判”,以免孩子产生逆反心理。

为了让儿歌摆脱尴尬的处境,我市教育部门正在展开多种尝试:管城区一些小学教师创作了短小精悍的儿歌,抄写在校园的墙上,用图文并茂的形式,吸引了很多同学观看和学唱;为了推出更多符合孩子们心理特点的儿歌,中原区一些学校鼓励孩子们自己创作属于自己的儿歌;我市举办青少年诗文书画大赛,首次将童谣设为单独赛事,引导优秀儿歌进校园、进课堂,让孩子们唱着健康有趣的儿歌,成长为“阳光少年”……



管城区引导学生传唱健康儿歌 (资料图片)

新闻时评

能否给孩子送上“国际标准”的礼物

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对童鞋、童车和儿童玩具进行了一次抽查,结果显示,童鞋不合格率为17.5%,童车不合格率为20%,塑胶玩具和电玩具不合格率为8%,部分玩具产品被发现含有重金属铅和铬。专家提醒说,相对于玩具中小零件和可触及锐利尖端带来的安全隐患,家长在为孩子购买玩具时,更应注意重金属的危害,避免含重金属的玩具使孩子造成慢性中毒。

“六一”儿童节来临之际,儿童用品的合格率、安全性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。质检总局就童鞋、童车、儿童玩具进行监督抽查,以此带动和加强对儿童用品市场的规范管理,为“六一”儿童节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。当然,抽查结果本身也说明,目前儿童用品市场的总体情况不容乐观,有些问题需要引起职能部门、监管部门及全社会的警惕。

这次抽查的童鞋、童车、儿童玩具都是国产儿童用品,用以衡量的也是儿童用品的“国家标准”,而当国产儿童用品出口国外时,它们将接受比中国“国标”更严格的“国际标准”的检验,不合格者将被拒绝出口。关于内销标准与出口标准之不同,童鞋、童车的情况似乎少有介绍,儿童玩具的情况则有详细的披露。据报道,目前国内市场上70%的塑胶玩具含有危害儿童健康的邻苯二甲酸酯,出口欧盟、美国的儿童玩具不含有此类物质。同时,欧盟的玩具标准对19种可能影响儿童健康的重金属含量加以限制,中国出口欧盟的玩具一般不含重金属;国内生产限制的种类只有8种,大多数玩具重金属含量超过欧盟标准,成为事实上的“毒玩具”。

潘洪其

且不说童鞋、童车等其他儿童用品,单说儿童玩具,同为中国企业生产,内销产品使用有毒的染料和原料,外销产品使用无毒的染料和原料,安全玩具给外国孩子玩,“毒玩具”只伤害中国孩子,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!固然,使用有毒染料和原料往往能降低成本,使内销的儿童用品具有某种价格优势,但是,关键的原因还在于,欧盟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玩具标准高于中国的玩具标准,引导着中国玩具企业“看人下菜碟儿”,分别按“国际标准”生产外销玩具,按“国内标准”生产内销玩具。就这一点而言,谓之“都是标准惹的祸”并不为过。

产品标准是对企业生产行为的硬约束,标准的宽严高低,直接决定了产品的性能与质量,也反映了职能部门和监管部门对产品安全的基本心态。包括儿童玩具在内,中国儿童用品的标准普遍低于国际标准,说明我们对儿童消费安全的重视还远远不够,进而言之,对儿童人身安全及各种权益的保障也未待加强。如果说,中国企业按照“国标”生产质量欠佳、安全性差的内销产品,主要是出于节约成本、追逐利润的“本能”,那么,职能部门和监管部门“本能”选择,应当是认真参照“国际标准”,果断摒弃陈旧的标准,及时改进行业标准,依法制定并严格执行更高的标准,尽最大努力遏制“毒玩具”等不合格儿童用品出厂。

当务之急,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高度,推动中国儿童用品标准尽快与国际标准接轨,以“全球治理”保障中国儿童的消费安全和人身安全,促进中国儿童用品行业健康发展。

开放社会更利于人们白手起家

一项调查结果显示,英国亿万富翁更多靠自己创业致富,而非通过继承

或部分继承,在这一点上高于美国富豪行政致富率。这项结果对于传统上认为美国更具社会流动性的观念形成挑战。(据《京华时报》)

在任何社会,财富始终有个来源问题。就是说作为有钱人,这些人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。在正常的社会里,与省吃俭用相比,企业家精神是更重要的致富途径。譬如,在一些国家,企业家确实是在冒险创办高利润的新式企业,如软件公司、零售网络等。发明新产品新技术和组建新公司、将新产品新技术带入市场的人,通过其创新行为获得“熊彼特利润”而致富。而财富通过继承方式集中在少数人手里,则是一种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因素。

创业难,而白手起家,在缺乏社会流动性的环境里创业致富、自我致富则难乎其难。即便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里,

那些靠个人能力致富的人,也都是具备丰沛的个性精神的人。他们追求财富的目的,不在于财富本身,更多地是为了对自身价值作一番认定。创业致富、自我致富与企业精神存在一种共生关系,对企业家精神作一个大致描述,就是企业家那种永不止歇的创新实践。一切向着创新,一切为了创新,这构成企业家的本质和灵魂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看到,靠创业致富的人,都善于动脑筋,或曰脑瓜灵活,不受陈规陋俗束缚;都充满信心,善于学习,并勇于冒险。白手起家不是说着玩的,不是想办到就能办到的,愿望仅是个前提,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创新个性的人,具有创新素质和精神的人,才能白手起家。

一个社会自行致富率愈高,说明这个社会开放程度愈高,也更具社会流动性。在社会学的解释里,有两种情况看起来最能促进向上流动:先进的工业发展和大规模的教育普及。那些向上流动的人都在起着一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问题,取得一个高于上一代人的社会地位,被称为代际流动。一个社会更具流动性,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表现。它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都产生极大的影响。一个社会要想进步,就必须具有某种途径,使出身寒门而才智过人者能够替换那些只有好血统但能力低下者。相对封闭的社会正缺乏此种选择的余地。用社会学家波普诺的说法是:封闭社会极大地浪费人力资源,他们不鼓励人们充分发挥其才能。也就是说,愈是封闭的社会,人们白手起家的可能性愈小。封闭社会的封闭性,能最大程度地为创业致富、自我致富设置障碍,使得社会的向上流动变得异常艰难。今语

解创新人才培养之“困”需用科学精神

灌输式的教育方式、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、不尽合理的评价体系……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团讨论现场,不少代表直指目前创新人才培养之“困”,呼吁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,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,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。(5月30日《北京晨报》)

人是创新的主体。一切创新,都在于人这个最具活力的因素。离开了人谈创新,犹如无根之木,无源之水。

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只能培养出有小用之“器”,而不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。这是因为,创新人才是全面发展的,更多的是在于创造精神的培养。培养一个人,不仅是灌输知识,还要培养思考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,要害在于人的浮躁、浮躁、浮躁心态。急功近利者为了功利目的,可以不顾基本的学术道德,甚至能够跨越做人的底线。粗制滥造、抄袭剽窃之不良学术行为皆源于急功近利。不尽合理的评价体系,牵扯的是学术评价的公平公正问题。缺少了公平公正精神,影响的是人创新的积极性,它会直接造成创新人才成长之“困”。

温家宝指出,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崇尚理性、勇于探索、追求真理,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,也是科

学精神的实质。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,更是一种文化、一种精神。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,才是真正有生机、有希望的民族。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。在科技领域,大力营造鼓励人先、敢于创造、敢冒风险、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,鼓励自由探索,发扬学术民主,提倡学术争鸣。

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离开了高层次创新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,就会造成创新的迟滞、创新的疲惫。创新也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本质特征,是一种文化的自觉。创新是科技发展、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,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,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,企业的利润会随时受到新生产方式、新发明创造的影响而消失,产生所谓“创造性的自灭”。因此,企业为确保自己的利润,就需要不断地创新,这种创新的压力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因。一个社会,一日也离不开创新。创新能激发社会无限的活力,创新能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受益。

创新人才培养之“困”,亦是一种环境之“困”。“困”中有困惑,更多的还是困顿、困扰,或曰创新人处境的艰难窘迫。可以说,整个社会距科学精神有多遥远,就离开创新人才培养之“困”难题有多遥远。伊文

所面临的种种压力,网友直呼“活不起啊活不起!”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,谁的工作压力不大?一项针对5000名职场人士展开的健康调查显示:目前,近七成职场人认为自己已存在“过劳”迹象,浑身酸痛、烦躁、抑郁是“过劳”三大杀手。而这正是“压二代”!我们都是“压二代”!我们从1岁到“挂了”,10幅图画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在现代社

会,更具备流动性。在社会学的解释里,有两种情况看起来最能促进向上流动:先进的工业发展和大规模的教育普及。那些向上流动的人都在起着一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问题,取得一个高于上一代人的社会地位,被称为代际流动。一个社会更具流动性,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表现。它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都产生极大的影响。一个社会要想进步,就必须具有某种途径,使出身寒门而才智过人者能够替换那些只有好血统但能力低下者。相对封闭的社会正缺乏此种选择的余地。用社会学家波普诺的说法是:封闭社会极大地浪费人力资源,他们不鼓励人们充分发挥其才能。也就是说,愈是封闭的社会,人们白手起家的可能性愈小。封闭社会的封闭性,能最大程度地为创业致富、自我致富设置障碍,使得社会的向上流动变得异常艰难。今语

会,更具备流动性。在社会学的解释里,有两种情况看起来最能促进向上流动:先进的工业发展和大规模的教育普及。那些向上流动的人都在起着一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问题,取得一个高于上一代人的社会地位,被称为代际流动。一个社会更具流动性,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表现。它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都产生极大的影响。一个社会要想进步,就必须具有某种途径,使出身寒门而才智过人者能够替换那些只有好血统但能力低下者。相对封闭的社会正缺乏此种选择的余地。用社会学家波普诺的说法是:封闭社会极大地浪费人力资源,他们不鼓励人们充分发挥其才能。也就是说,愈是封闭的社会,人们白手起家的可能性愈小。封闭社会的封闭性,能最大程度地为创业致富、自我致富设置障碍,使得社会的向上流动变得异常艰难。今语



压二代

你不是富二代、官二代?你爸也不是李刚?恭喜你,你和我一样,我们都是“压二代”!近日,网友“心忧忧”在华南论坛发帖,分享了一组网上热传的图画:“被压垮的一代又一代!我们都是压二代”!我们从1岁到“挂了”,10幅图画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在现代社

“被精神病”不能只依赖立法救赎

正常人因社会纠纷乃至家庭矛盾而被送入精神病院,“被精神病”威胁到个体安全,也因此成为社会关注热点。另一方面,数据显示,我国70%的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疗。他们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,有些甚至危及家人、社会和自身安全。(《新京报》5月31日)

“该治疗的进不去,不该进去的却被强制收治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精神卫生立法研究者刘白驹认为,有此乱象的一个重要原因,是立法滞后和相关法律存在缺陷。之前就有专家指出,制度性的缺陷,导致了精神病收治的混乱状况。

从现实的情况来看,通过完善立法和制度跟进,对精神病收治的制度性缺陷进行“救赎”,已经是一迫在眉睫的事情。无论是全面规范收治的程序、推进精神立法进程,还是在制度层面上明确国家责任、加大政府投入,以及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各项合法权益,都是应有的题中之义。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:“被精神病”的风险不仅仅来自于制度缺陷,不能只依赖立法救赎。

事实上,诸多“被精神病”的现实恶例,大多是权利诉求被压制和剥夺的信访者。前不久,深圳二院护士郭俊梅因不满奖金分配,向深圳市政府信访办投诉,医院外请医师假扮工会员领导与其谈话,并将谈话内容写入病历,将其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并调岗。郭俊梅起诉维权后胜诉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还是以郭俊梅事件为例。在本案中,律师认为,单一的诊断标准和制度上的救济漏洞是导致“被精神病”的主要原因。但实际上这与“诊断”和“漏洞”没有什么关系,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一单位与个体之间地位的严重不对等,导致个体的话语权极其式微,意见和表达不被尊重、不受保护,稍有“出格”即被“封杀”——这才是女护士维权上访“被精神病”的关键所在。一些行为正常、心态正常的公民,因为越级上访或者提出权利诉求,就被“强送”进精神病院成了“精神病患者”,这显然是精神立法缺失下的问题,而是权力越界与霸道,透射出某些地方权力大于法的现实语境。如此种种,纵然法律制度完善了,恐怕也难以避免“信访精神病”现象的再现。

立法缺陷导致“被精神病”只是表象,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对于权利的管制没有边界,缺乏有效监督。这样的权力异化之恶胜过洪水猛兽,在权力乱舞的洪流中,“被精神病”永远只是可感知权利风险的体现形式之一而不是全部。在此方面,对于法律的完善和对于权力的监控,同样重要,同样现实而迫切。陈一舟